

# 必以少陵為宗：論黃子雲《野鴻詩的》的極端尊杜觀

鄭宜娟\*

## 摘要

清乾隆年間，黃子雲《野鴻詩的》明言「必以少陵為宗」，是一部推尊盛唐杜甫的詩話，其因彰顯杜甫為千古唯一大家，以各種極端觀點：推尊杜甫歷來評價較低的七絕、抑李白揚杜甫、反對李商隱尚杜之說，凸出於屢見尊杜的清代詩壇。但因黃子雲較不為人所知，學界目前對這本詩話的研究甚稀，也未見涉及其尊杜理論的特殊性。

為能理解黃子雲尊杜的極端性，本文將透過清代詩論家的普遍觀點進行對照，可知：黃子雲扭轉杜甫的七絕評價，拉抬到有「七絕聖手」之稱的王昌齡、李白之上；又質疑歷來的李、杜並稱，各有專精的看法，認為「李不逮杜多矣」；而被視為深得於杜詩精髓的李商隱七律，黃子雲更是大力駁斥，深不以為然。

深究黃子雲上述「異調」的成因，與《野鴻詩的》起自《詩經》結至杜甫的詩學理路有關，加上黃子雲刻意展現個性化的詩論，是以形成「必宗少陵」的激烈觀點。藉由以上比對，不但能凸顯黃子雲尊杜詩觀的獨特所在，又能以《野鴻詩的》的一家之見反襯出清人在這些議題上的共識。

關鍵詞：黃子雲、《野鴻詩的》、杜甫、李白、李商隱

---

\*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碩士班



## 一、前言

清人黃子雲（1691-1754），字士龍，號野鴻，江蘇崑山（今江蘇省崑山市）人。

<sup>1</sup>沈德潛（1673-1769）《清詩別裁集》不僅錄其詩，更譽之為「天賦俊才」、「真堪壓倒元、白」。<sup>2</sup>清代錢泳（1759-1844）舉當朝七律有高出唐人者，也論及黃子雲之作。<sup>3</sup>因其終身未涉足官場，得晚清朱庭珍（1841-1903）評為「我朝四大布衣」。<sup>4</sup>

黃子雲於乾隆 2 年（1737）著有詩話《野鴻詩的》，沈德潛認為此書「多創論」。<sup>5</sup>郭紹虞撰於丁福保《清詩話》之〈前言〉即評有：「其論詩宗主杜甫，與一般詩話無宗主者不同，稱為詩的，或以此關係。」<sup>6</sup>除了點明《野鴻詩的》對杜詩的推崇，也涵蓋其論詩宗旨。確實，觀其詩話所載，開卷即言：「能鼓漢、魏之氣，擷六朝之精，含咀乎《三百篇》之神者，唯少陵一人。」<sup>7</sup>在首條即直指杜甫（712-770）為唯一一位能包融千古詩歌精要的詩人。乃至透過《野鴻詩的》中的主客問答之「子必以少陵為宗」<sup>8</sup>、「子宗杜陵」<sup>9</sup>等語，均可見黃子雲推重杜甫的詩觀。

然而清人論詩尊杜已是屢見不鮮，如孫微所言：「清代杜詩研究者們大多還是如宋代一樣，總是過分推尊杜甫及其詩歌，他們每每從儒家詩教的角度出發，

<sup>1</sup> 黃子雲的生平參自清·馮桂芬纂，清·李銘皖、譚鈞培修：《（同治）蘇州府志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8 年，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清光緒 8 年〔1882〕江蘇書局刻本），卷 96，人物 23，頁 24 上-24 下。

<sup>2</sup> 《清詩別裁集》收錄黃子雲詩作 11 首，沈德潛選評有：「野鴻天賦俊才，少歲詩無一語平庸，無一字輕浮，真堪壓倒元、白。」清·沈德潛：《清詩別裁集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香港分局，1977 年，影印乾隆 25 年〔1760〕教忠堂重訂本），卷 30，頁 15 下。

<sup>3</sup> 錢泳曾論：「本朝七律，金聲玉振，不特勝于有明一代，直可超出宋、元，而亦有高出唐人者，可謂極一時之盛，國初諸公無論矣，就余所見聞者，如……黃野鴻〈清明〉云：『村角鳥呼紅杏雨，陌頭人拜白楊烟。』」將黃子雲的七律亦舉為可勝於唐人的佳作。清·錢泳：《履園叢話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，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 18 年〔1838〕述德堂刻本），卷 8，頁 30 下-31 上。

<sup>4</sup> 清·朱庭珍：《筱園詩話》，卷 2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 12 月），頁 2372。

<sup>5</sup> 沈德潛作有〈懷人絕句〉23 首，其十云：「何妨仙跡尋徐福，亦自狂名續牧皮。縱酒說詩空眼界，依然瀛海泛舟時。」並評道：「黃野鴻，嘗之海外，後成《說詩》一卷，多創論。」表明此詩為黃子雲而作，詩中提及黃氏曾遊至海外的經歷，又言其詩話多有創見。清·沈德潛：《歸愚詩鈔》，卷 20，《沈歸愚詩文全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 年，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乾隆教忠堂刻本），頁 7 上。

<sup>6</sup> 郭紹虞：〈前言〉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（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 年 12 月），頁 21-22。

<sup>7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1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47。

<sup>8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6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48。

<sup>9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8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48。

尊崇杜甫為百世師法的『詩聖』。」<sup>10</sup>認為清人仍像宋代視杜甫為詩體中的道德典範，至於黃子雲，今人殷瑜分析道：「在黃子雲這裡，杜甫首先是一個繼承風騷傳統，……在詩教傳統上含咀《三百篇》之神，可算是詩之道統中的聖人。」<sup>11</sup>可知《野鴻詩的》秉持的思想大抵與同朝人一致。那本文何以言其「極端」？蓋因黃子雲的尊杜體現在以下三種說法：其一，扭轉杜詩七絕的評價，高舉至堪稱「七絕聖手」<sup>12</sup>的王昌齡（698-765）、李白（701-762）之上；其二，認為李白的詩學成就遠不如杜甫；其三，極力反駁李商隱詩（813-858）善學杜之定評，皆是《野鴻詩的》以尊杜為前提而衍生的極端論調。

歷來對於黃子雲及其《野鴻詩的》的相關研究並不多，學位論文僅見殷瑜《黃子雲「野鴻詩的」研究》，著重探討其詩學觀和詩法論，闡明了黃氏以兼濟天下之志與憂國憂民之情為詩作根柢，秉持詩歌應延續《詩經》教化傳統，而杜詩正是此種情志與詩教觀的最佳示範。<sup>13</sup>至於單篇論文，最早可見吳文治〈黃子雲及其詩論《野鴻詩的》〉，該文認為黃子雲主張詩乃抒寫性靈而影響後起的袁枚，時人學杜之弊即在於缺乏真情實感，亦略微涉及黃子雲對白居易、韓愈、李商隱等名詩家的貶斥。<sup>14</sup>另有王順貴〈沈德潛與其同調黃子雲格調論詩學觀辨析〉將黃子雲與清代格調派領袖沈德潛進行對照，認為前者也強調詩歌的政治教化，竭力讚揚杜甫的思想與人格等同於孔、孟高度，只是相較於沈德潛宗唐之餘，也能寬容地評價宋詩；黃子雲僅推尊漢魏、盛唐，對格局較窄的中、晚唐多所貶斥。<sup>15</sup>上述研究對《野鴻詩的》的論詩旨趣已有深入探討，然而因黃子雲的尊杜而涉及的詩體、對其他詩家的評價等，尚可再著力；甚至學者所提出的李白、杜甫均得

<sup>10</sup> 孫微：《清代杜詩學史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4年10月），頁47。

<sup>11</sup> 殷瑜：《黃子雲「野鴻詩的」研究》（長春：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，陳向春先生指導，2012年），頁20-21。

<sup>12</sup> 關於李白、王昌齡於七絕稱聖之說，明人高棅《唐詩品彙》於七絕「正宗」僅舉此兩人；胡應麟亦分別以「字字神境，篇篇神物」、「超凡入聖」，視李、王之七絕臻至聖境；許學夷亦云：「盛唐七言絕，太白、少伯而下，高、岑、摩詰亦多人於聖。」已然樹立以李、王為七絕頂峰的標準；直至清代潘德輿提出：「唐人除李青蓮之外，……七絕第一，其王龍標乎？……龍標以濃濃而至淡，皆聖手也。」方奠定李白、王昌齡為「七絕聖手」的絕對地位。第一項見明·高棅：《唐詩品彙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3年，影印汪宗尼校訂本），七言絕句敘目，頁1下-2上。第二項見明·許學夷著，杜維沫校點：《詩源辯體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7年10月），卷15，頁159。第三項見清·潘德輿：《養一齋詩話》，卷2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2024。

<sup>13</sup> 殷瑜：《黃子雲「野鴻詩的」研究》，頁8-23。

<sup>14</sup> 吳文治：〈黃子雲及其詩論《野鴻詩的》〉，《古代文學理論研究》第一輯（1979年12月），頁334-345。

<sup>15</sup> 王順貴：〈沈德潛與其同調黃子雲格調論詩學觀辨析〉，《西南交通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12卷第6期（2011年11月），頁35-40。

黃子雲讚揚之說，<sup>16</sup>也還有商榷空間。

因此本文除了闡釋黃子雲讚揚杜詩七絕、不認同李白與杜甫並稱，以及李商隱詩不肖杜甫，並試述這些說法的背後成因。過程中會輔以多位清代詩評家之論，使《野鴻詩的》在尊杜觀中表現出的極端性更形明顯。透過黃子雲的個人觀點，亦有助於再次印證清人於這些涉及杜詩的議題中，普遍抱持何種看法。

## 二、以杜甫七絕高出王昌齡、李白

黃子雲曾自述：「余童子時聞一二老宿嘗云：少陵五律各體盡善，七絕獨非所長。」<sup>17</sup>幼時被教導杜詩除了七絕之外，其餘詩體堪稱入聖。此說與明初高棅（1350-1423）《唐詩品彙》為彰顯杜詩兼容並蓄的成就與風範，專為之設立「大家」一席，僅餘絕句同於其他詩家歸入「羽翼」，<sup>18</sup>可謂異代相通。但是黃子雲卻不認同杜甫不擅七絕之說，首先他提出絕句優劣的關鍵在於：

絕句……當從《三百篇》中化出，便有韻味。<sup>19</sup>

用饒富韻味之《詩經》作為品評絕句的準繩，這與《野鴻詩的》開卷第一條即言：「含咀乎《三百篇》之神者，唯少陵一人。」<sup>20</sup>以能汲取《詩經》之神采精髓，彰顯杜甫千古一人的成就；此外，《野鴻詩的》最後一條重申：「《詩三百篇》曷貴乎？貴其悲哀歡愉，怨苦思慕，悉有婉折抑揚之致。」<sup>21</sup>該詩話以首尾呼應的方式，再次強調《詩經》抒情之真摯婉轉，甚為可貴。均可見黃子雲極為重視《詩經》，甚至援引《詩經》作為杜甫七絕動人的根據，其云：

<sup>16</sup> 王順貴說：「（黃子雲）對李白、杜甫兩位詩壇巨擘則稱揚備至。」但據本文探究，黃氏對李白頗有負評，也不認為其可與杜甫並肩，詳見本文第三節「黃子雲極端尊杜表現二：李白遠不如杜甫」。論文參見王順貴：〈沈德潛與其同調黃子雲格調論詩學觀辨析〉，《西南交通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12卷第6期（2011年11月），頁37。

<sup>17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20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1。

<sup>18</sup> 高棅對杜詩各體的歸類分別參見明·高棅：《唐詩品彙》，五言古詩敘目，頁4下-5上；七言古詩敘目，頁2下-3上；五言律詩敘目，頁3下-4上；五言排律敘目，頁3下；七言律詩敘目，頁2下；五言絕句敘目，頁2上；七言絕句敘目，頁2上。

<sup>19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20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1。

<sup>20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1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47。

<sup>21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111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66。

絕句字無多，意縱佳而讀之易索，……浣花深悉此弊，一掃而新之；既不以句勝，並不以意勝，直以風韻動人，洋洋乎愈歌愈妙。如〈尋花〉也，有曰：「詩酒尚堪驅使在，未須料理白頭人。」又曰：「桃花一簇開無主，可愛深紅更淺紅。」……少陵七絕實從《三百篇》來。<sup>22</sup>

黃子雲舉出杜甫七絕〈江畔獨步尋花〉的其二和其五，證明杜詩不在於立意出奇，而是具備《詩經》自然韻味，十分耐人咀嚼。

可是在清人詩論中，並未如黃子雲這般肯定杜甫七絕，像是：

工部之詩，……諸體擅場，絕句不妨稍紬，吾亦不能妄歎者。（王士禛等《師友詩傳錄》）<sup>23</sup>

少陵絕句，直抒胸臆，自是大家氣度，然以為正聲則未也。……楊廉夫謂學杜須從絕句入，真欺人語。（沈德潛《唐詩別裁集》）<sup>24</sup>

康熙朝祭酒王士禛(1634-1711)稱許杜甫諸體兼善，只有絕句的表現不夠理想，沈德潛《唐詩別裁集》亦持類似意見。縱然杜甫堪稱大家，沈德潛仍就事論事，指出杜詩不合絕句正格，並批評明人楊維禎(1296-1370)不該誤導學杜者從絕句入門。故而當沈德潛選取唐人七絕時，相較於採錄李白多達 20 首，王昌齡亦有 11 首獲得青睞，<sup>25</sup>杜甫卻僅 3 首入選，如此看來，沈德潛更可能出於向「大家」聊表敬意，方取有杜甫七絕。

亦有清人雖未直指杜甫七絕之缺失，然而其迥異於唐人正格之作的表現，只能另眼待之，例如：

<sup>22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20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51。

<sup>23</sup> 清·王士禛等：《師友詩傳錄》，第 30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145。

<sup>24</sup> 清·沈德潛：《唐詩別裁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 年 8 月），卷 20，頁 657。

<sup>25</sup> 李白與王昌齡入選的七絕詩數，分別參見清·沈德潛：《唐詩別裁集》，卷 20，頁 653-657；卷 19，頁 645-647。

杜七絕輪囷奇矯，不可名狀，在杜集中，另是一格。(葉燮《原詩》)<sup>26</sup>

詩至唐人七言絕句，盡善盡美。……少陵別是一體，殊不易學。(宋鞏《漫堂說詩》)<sup>27</sup>

葉燮(1627-1703)雖未明確批評杜甫七絕，但其無法以正規格律梳理的奇特性，只能為之另闢一席。宋鞏(1634-1714)也認為杜詩此體屬於偏格，不適合作為學習七絕的典範。

相較於杜甫七絕被指為不合正聲，或將其另置一體，對清人來說，真正在七絕超凡入聖者當屬李白、王昌齡，像是：

七言絕句，古今推李白、王昌齡。(葉燮《原詩》)<sup>28</sup>

七言……開元、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，李白、王昌齡尤為擅場。(王士禛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)<sup>29</sup>

唐人七言絕句，……太白、龍標，絕倫逸羣，龍標更有「詩天子」之號。(宋鞏《漫堂說詩》)<sup>30</sup>

七絕乃唐人樂章，……李白、王昌齡後，當以劉夢得為最。(李重華《貞一齋詩說》)<sup>31</sup>

<sup>26</sup> 清·葉燮：《原詩》，卷4外編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610。

<sup>27</sup> 清·宋鞏：《漫堂說詩》，第10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419。

<sup>28</sup> 清·葉燮：《原詩》，卷4外編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610。

<sup>29</sup> 清·王士禛：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0年，影印康熙洪氏松花屋本)，卷前〈凡例〉，頁1上。

<sup>30</sup> 清·宋鞏：《漫堂說詩》，第11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419。

<sup>31</sup> 清·李重華：《貞一齋詩說》，「論詩雜談」第8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

王士禛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以李白、王昌齡七絕力壓盛唐群雄；葉燮則認為不止於唐朝，李、王詩作更可謂百代之冠。宋鞏除了並舉李白、王昌齡，又格外稱揚後者七絕的超群成就。李重華（1682-1755）已然視二人為頂標，方論及劉禹錫（772-842）等其餘唐人。很顯然地，李白、王昌齡於七絕無出其右，可說是清代詩壇的共識。

相形之下，黃子雲不僅強調杜甫七絕高妙，還提出與清人迥異的定位：

龍標、供奉，擅場一時，美則美矣，微嫌有窠臼。其餘亦互有甲乙。總之：未能脫調，往往至第三句意欲取新，作一勢喝起，末或順流瀉下，或回波倒捲。……少陵七絕實從《三百篇》來，高駕王、李諸公多矣。<sup>32</sup>

他先點出公認的「七絕聖手」——王昌齡、李白，其實未臻完美，進一步指摘連同二人在內，創作時常有第三句「意欲取新」的模式，反觀源於《詩經》的杜甫七絕樸實自然，被黃子雲高舉至王、李二家之上。

黃子雲推崇杜甫七絕尚可說是個人的審美觀點，無可厚非，但為了彰顯杜詩的絕對價值，他不僅否定於七絕擅場的李白、王昌齡，更將兩位詩家置於杜甫之下，堪稱當時異調。如此也導致這種立論不夠穩妥，以下即從《野鴻詩的》的矛盾和規避之處加以分析。首先，黃子雲細述自己學杜的進程：

及年二十，於少陵**五律**稍有得；越數年從海外歸，**七古歌行**亦有得；迨三十七、八時，奔走嶺外，**五古、七律**始窺堂戶；明年於新安道上，方悟少陵**七絕**實從《三百篇》來，……然僅可與知者道也。<sup>33</sup>

他在參透五律、七古、五古、七律後，方體悟杜甫七絕的奧妙，按理說，「七

---

頁 925。

<sup>32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20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51。

<sup>33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20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51。

絕」應成為黃子雲說詩的關鍵，但《野鴻詩的》於七律卻解說得更為詳盡，譬如指摘後人學杜甫七律的問題在於：

起無氣，句無調，字不堅牢，意不排蕩，對偶不靈活，情景不真新，當句自解，歸結無致，句中不見作者氣象，使事不免筆端拘滯。<sup>34</sup>

換言之，起結有致、對仗靈活、氣象雄邁云云，皆可謂杜詩七律的特色，呼應黃子雲評杜甫七律：「七律則上下千百年無倫比。其意之精密，法之變化，句之沈雄，字之整練，氣之浩汗，神之搖曳，非一時筆舌所能罄。」<sup>35</sup>能一一細數此體表現的獨特之處。以此對比黃子雲僅以「風韻動人，洋洋乎愈歌愈妙」<sup>36</sup>稱揚杜甫七絕，便顯得含糊籠統。

關於杜甫的七律與七絕，前者的成就可謂有目共睹，交口稱譽，像是：

學前諸家七律，久而有所得，然後取杜詩讀之，譬如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也。此是究竟歸宿處。（王士禛《然鐙記聞》）<sup>37</sup>

七言律……獨少陵包三唐，該正變，為廣大教化主。（宋肇《漫堂說詩》）

38

（七言律）老杜以宏才卓識，盛氣大力勝之。……目為大成，非虛言也。

（沈德潛《說詩碎語》）<sup>39</sup>

不論是以杜詩為唯一包舉唐人七律者，或稱許其才學豐厚、氣勢雄偉，諸位

<sup>34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57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9。

<sup>35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18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0。

<sup>36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20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1。

<sup>37</sup> 清·王士禛：《然鐙記聞》，第18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121。

<sup>38</sup> 清·宋肇：《漫堂說詩》，第9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418-419。

<sup>39</sup> 清·沈德潛：《說詩碎語》，卷上，第114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540-541。

詩評家無一不是極力讚揚，即使黃子雲稱頌杜甫七律「上下千百年無倫比」，實與諸家所論相去不遠，並無殊異之處。

相反地，《野鴻詩的》抬高杜詩七絕的地位不僅異常，其評語也確實存在問題。明代胡應麟（1551-1602）曾言「絕句最貴含蓄」，<sup>40</sup>沈德潛也有類似的看法：

七言絕句，貴言微旨遠，語淺情深，如清廟瑟，一倡而三嘆，有遺音者矣。<sup>41</sup>

由於七絕講求深情婉轉，餘韻無窮，反觀杜詩如〈戲為六絕句〉，清人仇兆鰲（1638-1717）評以「氣格才情，迥異常調」，<sup>42</sup>固然揚其縱橫豪情，但不同於「常調」也證明杜甫以七絕為議論，便失去此體原有的含蓄韻味。再者，杜詩像〈江畔獨步尋花〉其六的「留連戲蝶時時舞，自在嬌鶯恰恰啼」、其七的「繁枝容易紛紛落，嫩蕊商量細細開」，<sup>43</sup>皆用對句為七絕作結，誠如胡應麟所謂：

卒章俱作對結，非絕句正體也。<sup>44</sup>

當絕句著重寫景對仗，刻意求工，便難見自然真情與一氣呵成，這也是為何有「少陵絕句對結，詩家率以半律譏之」，<sup>45</sup>因為杜甫絕句如同割裂律詩的對偶而成。那麼黃子雲大力讚頌杜甫七絕「直以風韻動人，洋洋乎愈歌愈妙，……實從《三百篇》來」<sup>46</sup>，與杜詩的實際表現相距甚遠，其以「僅可與知者道」概論杜甫七絕之妙，就顯得空泛無力。

<sup>40</sup> 明·胡應麟：《詩藪》（臺北：文馨出版社，1973年5月），內編卷6，頁112。

<sup>41</sup> 清·沈德潛：《唐詩別裁集》，卷前〈凡例〉，頁3。

<sup>42</sup> 唐·杜甫著，清·仇兆鰲注：《杜詩詳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0年7月），卷11，頁901-902。

<sup>43</sup> 杜甫〈江畔獨步尋花〉其六曰：「黃四娘家花滿蹊，千朵萬朵壓枝低。留連戲蝶時時舞，自在嬌鶯恰恰啼。」其七曰：「不是愛花即欲死，只恐花盡老相催。繁枝容易紛紛落，嫩蕊商量細細開。」參見唐·杜甫著，清·仇兆鰲注：《杜詩詳注》，卷10，頁818、819。

<sup>44</sup> 明·胡應麟：《詩藪》，內編卷6，頁103。

<sup>45</sup> 明·胡應麟：《詩藪》，內編卷6，頁111。

<sup>46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20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1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野鴻詩的》完全沒有論及杜甫五絕。從明代王世貞(1526-1590)提出「絕句固自難，五言尤甚」，<sup>47</sup>沈德潛亦認為五絕「純是化機，不關人力」，<sup>48</sup>七言縮減為五言，抽離了迴旋的空間，更講求渾然天成。因此，清人施補華(1835-1890)即使評杜詩七絕「槎枒粗硬」，尚言：「獨〈贈花卿〉一首，最為婉而多諷。……〈江南贈李龜年〉詩，亦有韻。」<sup>49</sup>以〈贈花卿〉、〈江南逢李龜年〉為杜甫少數具有諷諭或感慨的七絕佳作。<sup>50</sup>但施補華卻直言杜甫「不能作五絕，蓋才太大，筆太剛」，<sup>51</sup>杜甫的宏闊手筆加上慣於對仗，尤不適合講究自然無跡的五絕。故而黃子雲強以杜甫七絕高駕公認的李、王兩位聖手，尚能以「僅可與知者道」如此唯心論地自圓其說，但對於杜詩創作評價更低的五絕，<sup>52</sup>在無法曲護左袒的情況下，便逕自避而不談，箇中心態，頗令人玩味。

### 三、 主張李白遠不如杜甫

黃子雲的極端尊杜觀，還表現在其他詩家不得與杜甫並列的議論上。黃子雲先是稱杜甫為：

兼《風》、《騷》、漢、魏、六朝而成詩聖者也。<sup>53</sup>

視作繼承千古精要的偉大詩人並非新穎的觀點，早在唐代元稹(779-831)譽為「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人人之所獨專」，<sup>54</sup>隱然有此意味。清人賀貽孫(1605-1688)

<sup>47</sup> 明·王世貞：《藝苑卮言》，卷1，清·何文煥、丁福保編：《歷代詩話統編》第3冊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338。

<sup>48</sup> 清·沈德潛：《唐詩別裁集》，卷前〈凡例〉，頁3。

<sup>49</sup> 清·施補華：《峴傭說詩》，第208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998。

<sup>50</sup> 除了施補華的褒詞，《杜詩鏡銓》也評〈贈花卿〉「似諛似諷，……亦復何減龍標、供奉」，又引黃生評〈江南逢李龜年〉所云：「言外黯然，即使太白、少伯操筆，當無以過。」是杜詩中罕有媲美李白、王昌齡的七絕。兩條評語分別參見唐·杜甫著，清·楊倫箋注：《杜詩鏡銓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7月），卷8，頁369；卷20，頁1018。

<sup>51</sup> 清·施補華：《峴傭說詩》，第180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995。

<sup>52</sup> 杜詩五絕不甚理想之說，另有如《杜臆》評〈絕句六首〉：「名人不拘，而終不可為法。」《杜詩鏡銓》亦於〈復愁十二首〉引邵寶所云：「非杜能事，聊存一格。」注杜家均坦言杜甫不善於五絕。第一項見明·王嗣奭：《杜臆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86年11月），卷6，頁192。第二項見唐·杜甫著，清·楊倫箋注：《杜詩鏡銓》，卷17，頁820。

<sup>53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6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48。

<sup>54</sup> 唐·元稹：〈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〉，《新刊元微之文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蜀刻本），卷56，頁4上。

所謂的「子美詩聖」<sup>55</sup>、宋大樽（1746-1804）的「李仙、杜聖固已」<sup>56</sup>等，也不斷重申這樣的定位。然而黃子雲與眾不同之處在於：

外此若沈、宋、高、岑、王、孟、元、白、韋、柳、溫、李、太白、次山、昌黎、昌谷輩，猶聖門之四科，要皆具體而微。（《野鴻詩的》06）

不論初、盛、中、晚期的唐詩名人，一律視為較低一階的眾門徒，其中尤以李白被拔出如雷貫耳的「李、杜」並稱之位，改與其他詩人齊名，更是令人矚目。

李、杜理應不存有境界或成就高下之別，一如唐代韓愈（768-824）即以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」<sup>57</sup>共推二家之作。直至清人仍抱持李、杜並稱的論點如下：

李、杜所以稱大家者，無意之詩，十不得一二也。（王夫之《薑齋詩話》）<sup>58</sup>

不遍讀盛唐諸家，不見李、杜之妙。（賀裳《載酒園詩話·又編》）<sup>59</sup>

上則溯源於曹、陸、……六七名家，又探索李、杜大家，以植其根柢；下則汎濫於宋、元、明諸家。（宋荦《漫堂說詩》）<sup>60</sup>

清初王夫之（1619-1692）便是以其所重視的詩情興發再次肯定李白、杜甫當為大家。賀裳（約康熙年間）認為藉由盛唐眾詩家更能共顯李、杜詩之精妙。當宋荦指導如何擴大取材，或細數知名詩人、或泛稱該朝名稱，偉哉唐詩竟獨以李白、杜

<sup>55</sup> 清·賀貽孫：《詩筏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 167。

<sup>56</sup> 清·宋大樽：《茗香詩論》，第 4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103。

<sup>57</sup> 唐·韓愈：〈調張籍〉，清·方世舉著，郝潤華、丁俊麗整理：《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 年 5 月），卷 9，頁 517。

<sup>58</sup> 清·王夫之：《薑齋詩話》，卷下，第 2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。

<sup>59</sup> 清·賀裳：《載酒園詩話·又編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 315-316。

<sup>60</sup> 清·宋荦：《漫堂說詩》，第 1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416。

甫來概括，更見二人堪為詩壇冠冕。

黃子雲卻不以為然，直指李白之於杜甫實則望塵莫及：

太白以天資勝，下筆敏速，時有神來之句，而**羸劣淺率**處亦在此。少陵以學力勝，下筆精詳，無非情摯之詞，晦翁稱其詩聖亦在此。……當時稱譽，李加乎上者，太白天潢貴胄，**加之先達**；子美杜陵布衣，矧夫後起。若究二公優劣，**李不逮多矣**。然其歌行樂府，俊逸絕群，未肯向少陵北面。

61

黃子雲先是肯定李白的天資，故在樂府古詩這類無固定格式，更講求詩人才氣的體裁，確實可見李白之才情。這也與清人賀貽孫《詩筏》稱「太白仙才」<sup>62</sup>、顧嗣立（1665-1722）的「豈非仙才」<sup>63</sup>等前人看法都很類似。但相較於黃子雲再三提及杜甫堪為詩聖，<sup>64</sup>對應的仙才、詩仙等加諸李白之盛譽卻不見於《野鴻詩的》，蓋因黃子雲認為恃才而下筆草率，乃李詩缺失所在，比起積累學力的杜甫，更凸顯李白不夠穩健切實。是以黃子雲進一步斷言李白憑藉國姓「李氏」的先天優勢，<sup>65</sup>加上比杜甫更早顯名於世，方得時人擁戴，若剔除基準點差異，杜詩實遠在李詩之上。

再者，黃子雲揚杜「無非情摯之詞」，正可參照其他非議李白的條目：

遊仙詩本之《離騷》，蓋靈均處穢亂之朝，蹈危疑之際，聊為烏有之

<sup>61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95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63。

<sup>62</sup> 清·賀貽孫：《詩筏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167。

<sup>63</sup> 《寒廳詩話》記明清之際的周斯盛評李白〈峨眉山月歌〉曰：「四句中連用峨眉、平羌、清溪、三峽、渝州五地名，絕無痕跡，豈非仙才？」讚揚李白極富詩才，能將多處地名自然地融入詩中。清·顧嗣立：《寒廳詩話》，第12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。

<sup>64</sup> 除了本文上一節所引用的第6條「兼《風》、《騷》、漢、魏、六朝而成詩聖者也」，《野鴻詩的》尚有第75條「古來稱詩聖者唯陶、杜二公而已」，以及此處的第95條「晦翁稱其詩聖亦在此」，有多條皆以「詩聖」稱譽杜甫。上述條目分別參見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48、頁862、頁863。

<sup>65</sup> 對於李白與皇家李唐是否有關，於《野鴻詩的》而言，其所謂的「天潢貴胄」便是主張李白為皇室宗族。至於李白的身世問題，據近人張書城從唐人李陽冰〈草堂集序〉的「李白，字太白，隴西成紀人」，輔以陳寅恪〈李唐氏族之推測〉，張氏考證執掌皇權的趙郡李唐乃附宗於望族第一的隴西李氏，如此則導致李白與李唐皇室有所關聯。詳見張書城：〈說李白「本姓李，其先隴西成紀人」〉，《天水師專學報（哲社版）》1991年第2期（月分不詳），頁112。

詞以寄興焉耳。……景純、太白亦恣意描摹。<sup>66</sup>

不真不誠，下筆安能變易而不窮？是故康樂無聊，慣裁理語；青蓮窘步，便說神仙。<sup>67</sup>

黃子雲認為遊仙詩本源自屈原(343B.C.-278B.C.)在亂世藉興象抒懷或矯託避禍，但在李白、郭璞(276-324)筆下，卻成為徒以形似，缺乏內在興寄的模擬之作。另外，同於謝靈運(385-433)慣性說理，李白也慣性套入神仙題材，以解決苦無靈感的困境，這類「不真不誠」的模式化創作在黃子雲看來，如何攀比情摯的杜詩？

然而李白當真浪得虛名，較杜「不逮多矣」？事實上，杜甫本人早以「白也詩無敵，飄然思不羣」<sup>68</sup>、「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」<sup>69</sup>稱頌李詩灑脫雄豪。清代不但延續「李、杜並稱」，縱然分述二家也認為是各擅其美，譬如：

太白胸懷高曠，……其言如風捲雲舒，無可蹤跡；子美思深力大，……其言如水歸壑，靡坎不盈。兩公之才，非惟不能兼，實亦不可兼也。(賀裳《載酒園詩話·又編》)<sup>70</sup>

吾于天才得李太白，于地才得杜子美。(徐增《而菴詩話》)<sup>71</sup>

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，太白也；使人慷慨激烈，歎歎欲絕者，子美也。  
(田同之《西園詩說》)<sup>72</sup>

<sup>66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27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3。

<sup>67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49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7。

<sup>68</sup> 出自杜甫〈春日憶李白〉，參見唐·杜甫著，清·仇兆鰲注：《杜詩詳注》，卷1，頁52。

<sup>69</sup> 出自杜甫〈寄李十二白二十韻〉，參見唐·杜甫著，清·仇兆鰲注：《杜詩詳注》，卷8，頁661。

<sup>70</sup> 清·賀裳：《載酒園詩話·又編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315-316。

<sup>71</sup> 清·徐增：《而菴詩話》，第3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427。

<sup>72</sup> 清·田同之：《西園詩說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752。

賀裳以曠達飄逸和思精氣雄分述李、杜之才。徐增（1612-?）自述其詩學心得時，以天生橫溢才華與後天苦學力文來概論李、杜。田同之（約康熙年間）形容李詩離塵脫俗，讀之如輕盈飛升；杜詩則情緒飽滿，易引人歌哭。可知二位詩家不僅各有千秋，且如賀裳所謂的無法相互涵括。這與黃子雲批評李詩「淺率」、「恣意描摹」、「不真不誠」，實在大相逕庭。

即使晚於黃子雲，清代詩評家仍維持前輩認為李、杜詩雙峰並峙的一貫說法，像是：

有唐詩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，……同時並出，與之頡頏上下，齊驅中原，勢均力敵而無所多讓，太白亦千古一人也。（清高宗《唐宋詩醇》）

73

（李、杜）不容區分優劣也。（翁方綱《石洲詩話》）<sup>74</sup>

太白為詩中仙，子美為詩中聖，屹然兩大，狎主齊盟。（朱庭珍《筱園詩話》）<sup>75</sup>

成書於乾隆 15 年的《御選唐宋詩醇》中，<sup>76</sup>乾隆帝認為李白與集大成的杜甫同為獨步千古的大家。乾、嘉時期的翁方綱（1733-1818）除了強調他們的詩歌成就莫可軒輊，另有「青蓮、少陵所以齊名千古」<sup>77</sup>、「二家為有唐一代詩人冠冕」<sup>78</sup>等評語，多次將其相提並論；值至晚清朱庭珍也未改詩仙、詩聖之譽，且以兩者為工力悉敵的大詩人。至此可知，相較於清人普遍視李白、杜甫同為大家而不須刻意區別高下，《野鴻詩的》分判「李不逮多矣」，實乃清代詩壇前無古人、後無來者的異端論調。

<sup>73</sup> 清·清高宗御選：《唐宋詩醇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71年1月），卷1，頁1。

<sup>74</sup> 清·翁方綱：《石洲詩話》，卷1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1372。

<sup>75</sup> 清·朱庭珍：《筱園詩話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2329。

<sup>76</sup> 〈御選唐宋詩醇序〉有乾隆帝親題「乾隆十五年庚午夏六月既望四日御筆」，可知其成書時間晚於《野鴻詩的》的「乾隆二年」。清·清高宗御選：《唐宋詩醇》，卷前序，頁3。

<sup>77</sup> 清·翁方綱：《七言詩三昧舉隅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289。

<sup>78</sup> 清·翁方綱：《石洲詩話》，卷1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1372。

#### 四、 批評李商隱詩肖杜詩之說

晚唐李商隱詩得之於杜甫的說法，在清代評論中相當常見，例如清初吳喬（1610-1694）說：「少陵詩是義山根本得力處。」<sup>79</sup>以李商隱詩根源於杜甫；又如薛雪（1681-1770）直言：「學杜詩，當從玉溪入。」<sup>80</sup>逕以李詩為抵達杜甫精髓的最佳引導。清人尤其認為李商隱七律最得杜甫神髓，像是：

七言律詩，……義山繼起，入少陵之室，而運以穠麗，盡態極妍。（錢良擇《唐音審體》）<sup>81</sup>

七言律……義山學杜最佳，法亦至細，善學人可借作梯級。（李重華《貞一齋詩說》）<sup>82</sup>

中晚七律能手，……皆絕不學杜，非杜詩開之也。略能學杜而涉其藩籬者，惟一李義山，遂為晚唐七律之冠。（潘德輿《養一齋·李杜詩話》）<sup>83</sup>

善學少陵七言律者，終唐之世，惟李義山一人。（管世銘《讀雪山房唐詩序例》）<sup>84</sup>

著重辨明格律的《唐音審體》評李商隱藉由學杜而於七律登堂入室。李重華亦以李商隱七律酷肖杜甫，後人可引為學習。潘德輿（1785-1839）論斷七律優劣的關鍵即在學杜與否，並直指李商隱正是因此冠絕晚唐，同於管世銘（1738-1824）亦直指李詩是唯一肖杜七律的唐人。諸位詩評家不僅極為肯定李商隱善學杜，更因

<sup>79</sup> 清·吳喬：《圍爐詩話》，卷3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569。

<sup>80</sup> 清·薛雪：《一瓢詩話》，第170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706-707。

<sup>81</sup> 清·錢良擇：《唐音審體》（昭質堂藏板，臺北國家圖書館藏），卷15，頁1上。

<sup>82</sup> 清·李重華：《貞一齋詩說》，論詩雜談第6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925。

<sup>83</sup> 清·潘德輿：《養一齋·李杜詩話》，卷2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2197-2198。

<sup>84</sup> 清·管世銘：《讀雪山房唐詩序例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1555。

深得於杜甫七律，李詩足以冠絕一時。

另外，清人在李詩學杜的議題上，除了七律之外，又往往延伸到其他詩體，像是：

義山綺才豔骨，作古詩乃學少陵，……頗能質朴。（賀裳《載酒園詩話·又編》）<sup>85</sup>

排律……，晚唐李商隱刻意學杜，亦是精麗。（宋犖《漫堂說詩》）<sup>86</sup>

或於古詩，縱然李商隱確有晚唐綺麗風格，賀裳仍以其詩有杜甫之樸實韻味；或於五言排律，宋犖認為李商隱乃有意識地汲取杜詩之絢麗精美。很顯然地，李詩瓣香於杜甫，應是清代詩家的普遍看法。

然而《野鴻詩的》卻對此共識特別不以為然，並專列條目反駁：

人皆謂杜陵歿後，義山可為肖子。吁！何弗思之甚耶？彼之渾厚在作氣，此之渾厚在填事；彼之風喻必指實，此之風喻動涉虛；彼則意無不正，此則思無不邪。風馬之形，大相徑庭，奚待一一量較，而後知其偽哉？<sup>87</sup>

劈頭即痛斥眾口稱善的李商隱尚似杜詩之說，並透過杜甫的創作兼具氣勢、興寄且高雅端正，細數李詩反而有堆垛典故、無病呻吟、詩旨邪僻等罪狀，認為二者判如天壤，持之附於詩聖，實在愚昧無知。

此外，或許唯恐開端的「不肖杜陵」之說不夠振聾發聵，黃子雲又有攻訐李商隱的擬杜詩曰：

〈蜀中離席〉詩，上半**酷傲少陵**，頸聯云：「座中醉客延醒客，江上

<sup>85</sup> 清·賀裳：《載酒園詩話·又編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374。

<sup>86</sup> 清·宋犖：《漫堂說詩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第8條，《清詩話》，頁418。

<sup>87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29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4。

晴雲雜雨雲」，此乳臭語耳；雖從「桃花細逐楊花落，黃鳥時兼白鳥飛」二句脫來，薰蕕判然。若「美酒成都堪送老，當爐仍是卓文君」，又入魔鬼道矣。<sup>88</sup>

這首明顯模仿杜甫〈曲江對酒〉的「桃花細逐楊花落，黃鳥時兼白鳥飛」當句對的特色，黃子雲卻對此嗤之以鼻，認為相形之下，李商隱造語稚嫩淺陋，與杜甫簡直有雲泥之別。

相形之下，這首〈杜工部蜀中離席〉卻獲得清人高度的肯定，例如：

介甫謂義山深有得於少陵，而止讚「雪嶺未歸」一聯，是見其煉句，而未見其煉局也。（吳喬《答萬季野詩問》）<sup>89</sup>

兩路夾寫出惜別，如此結構，真老杜正嫡也。……此等詩須合全體觀之，不可以一字一句求其工拙。荊公只賞他次聯，猶是皮相。（何焯《義門讀書記》）<sup>90</sup>

分明是老杜化身。回鶻之驕，吐蕃之橫，至今可想，豈止徒作壯語。（張謙宜《緝齋詩談》）<sup>91</sup>

清初吳喬與康熙朝的何焯（1661-1722）均認為宋人王安石（1021-1086）僅讚賞頸聯，尚不足以顯現李商隱在整體詩作的布局精煉。同為康熙年間的張謙宜（1650-1733）亦論此詩不徒以邊境豪語妝點，已然企及杜詩功力，能使人對外族侵凌的動盪局勢感同身受。上述早於黃子雲的前輩們，無一不是稱揚此詩煉飾精切，認可

<sup>88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28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53-854。

<sup>89</sup> 清·吳喬：《答萬季野詩問》，第 11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28。

<sup>90</sup> 清·何焯：《義門讀書記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5 年，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影印乾隆 34 年〔1769〕本衙藏板），李義山詩集卷上，頁 6 上。

<sup>91</sup> 清·張謙宜：《緝齋詩談》，卷 5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 854。

李商隱正是深得詩聖杜甫的神髓，才能擬作至此佳境。

反觀黃子雲，不僅評論〈杜工部蜀中離席〉與時人南轅北轍，還批評李商隱用以自遣的尾聯<sup>92</sup>是「入魔鬼道」，連帶的抨擊其他李商隱的詩作，如：

「錦瑟無端五十絃，一絃一柱思華年」，……強題之曰「錦瑟無端」，原其意亦不自解，而反弁之卷首者，欲以欺後世之人，知我之篇章興寄，未易度量也。……〈馬嵬〉詩云：「如何四紀為天子，不及盧家有莫愁？」何擬人不倫乃爾？……〈隋宮〉詩：「玉璽不緣歸日角，錦帆應是到天涯」，……語雖工而作意何在？<sup>93</sup>

名作〈錦瑟〉縱有前賢褒揚「義山晚唐佳手，佳莫佳於此矣」<sup>94</sup>、「此是一副不遇血淚，雙手掬出，何嘗是豔作？」<sup>95</sup>，黃子雲卻批駁此詩強求對仗而堆砌成句，又故作不明詞彙惑人耳目。〈馬嵬〉結尾以尋常人家反諷，凸顯李商隱對玄宗無能的指責，卻遭黃子雲扣以詩人悖於倫常綱紀的大帽子。〈隋宮〉頸聯的對仗巧麗，也被批評是毫無寄託又語焉不詳。

黃子雲對上述後人稱道的李商隱佳作，當真是不予一星半點的認可，整部《野鴻詩的》中，勉強算得上稱許李詩的評語是：

唯〈韓碑〉一首乃為可取，惜「彼何人哉軒與羲」句，惡劣不堪誦耳。

96

唯一入得黃子雲法眼的李商隱詩，就只有這首七言古詩〈韓碑〉，僅僅指其中一句過於口語，缺乏詩歌美感而已。耐人尋味的是：《野鴻詩的》——點名指

<sup>92</sup> 此詩尾聯為李商隱自我排遣之說，引自黃叔燦所云：「一結言成都猶有可樂，當墟仍是文君，蓋自遣之詞也。」參清·黃叔燦：《唐詩箋注》（松筠書屋藏板，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），卷5，頁23下。

<sup>93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28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3-854。

<sup>94</sup> 此評出自清人陸次雲《五朝詩善鳴集》，筆者未能見得原文，轉引自陳伯海主編：《唐詩彙評》（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5月），頁2410。

<sup>95</sup> 清·薛雪：《一瓢詩話》，第33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685。

<sup>96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28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3-854。

斥的〈錦瑟〉、〈馬嵬〉、〈隋宮〉，連同〈杜工部蜀中離席〉在內，均為七言律詩；然而〈韓碑〉非但不屬此體，更常被比擬於中唐韓愈之作。<sup>97</sup>如此看來，黃子雲極力否定的李商隱詩，正是時人評為深得於杜的作品或體裁；與杜甫無甚關聯者，使得黃子雲輕輕放下。

另外，一如黃子雲指斥〈錦瑟〉乃「欲欺後世」，已上升至詩人品格，還有其他條目批評李商隱有違正道：

義山專求有娥、皇英之喻而推廣之，倡為妖淫靡曼之詞，……謂之為《三百篇》之罪人可也。<sup>98</sup>

(溫、李)專搜漢、魏諸祕書，括其事之冷寂而罕見者，……以誇耀己之學問淵博，……其品操又安用考厥平生而後知其邪僻哉？<sup>99</sup>

黃子雲認為李商隱專以女性愛戀譜寫綺靡之詩，悖逆詩教堪如邪魔外道；又譴責其與晚唐名家溫庭筠(812-870)用典不偕詩旨，創作只為了露才揚己，是以據此論斷其心性邪曲。換言之，黃子雲已以「罪人」、「邪僻」抨擊李商隱的品行，即從根本的人心否定之，又怎能接受這種邪魔與黃子雲力推的詩聖杜甫相提並論？不過相較於沈德潛評李詩「不愧讀書人持論」<sup>100</sup>、翁方綱亦言「可謂真能知詩」<sup>101</sup>，知名詩評家均十分肯定李商隱的儒家立論或詩學見識，更襯托黃子雲責其道

<sup>97</sup> 李商隱〈韓碑〉除了旨在韓愈撰碑文一事，詩評家亦常以此作媲美韓詩，如賀裳云：「〈韓碑〉詩亦甚肖韓。」王士禛亦曰：「李義山〈韓碑〉一篇，直追昌黎。」第一項見清·賀裳：《載酒園詩話·又編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 374。第二項見清·王士禛：《古詩箋》（松江文萃堂藏板，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），卷前〈七言詩凡例〉，頁 2 上。

<sup>98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27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53。

<sup>99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45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57。

<sup>100</sup> 沈德潛評李商隱詩曰：「詠史十數章，得杜陵一體。至云：『但須鸞鷲巢阿閣，豈假鷓鴣在泮林！』不愧讀書人持論。」肯定其詠史詩不僅源於杜，修德以招賢者之旨更合乎儒家內聖外王的思想。參見清·沈德潛：《說詩碎語》，卷上，第 117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541。

<sup>101</sup> 翁方綱曾對李商隱詩「李杜操持事略齊，三才萬象共端倪」評道：「青蓮、少陵所以齊名千古者，此二語道盡矣。……若義山之論，可謂真能知詩，真能知李、杜者。」對於李商隱能點明李、杜並列才氣恢弘、筆參造化的大詩人，翁方綱更認可其已然參悟二家精要。參見清·翁方綱：《七言詩三昧舉隅》，「李翰林金陵城西樓月下吟」條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

德缺失與力駁相尚之說，當真與時論形成強烈反差。

## 五、黃子雲極端尊杜的原因

除了上述三種見於《野鴻詩的》的極端尊杜表現，黃子雲另著有《浣花集箋》、《長吟閣詩集》，<sup>102</sup>不論是取自浣花草堂，抑或出自杜詩〈解悶十二首〉其七的「新詩改罷自長吟」，<sup>103</sup>皆可見黃子雲對杜甫的景仰。然其何以尊杜至此？殷瑜曾指出黃子雲因提倡詩教而標舉杜甫，並就生平說道：「杜甫仕途坎坷，黃子雲更是以布衣終身，使人有『英俊沉下僚』之歎。不止如此，二人生活都顛沛流離，……相似的經歷必然使兩位詩人之間有共鳴。」<sup>104</sup>認為杜甫有志難伸與流離漂泊，讓黃子雲感同身受並加以推崇。<sup>105</sup>只是不遇與飄零當屬古代文人常見的悲歌，是否有更為個人的因素導致其推崇得如此「極端」？以下即從黃子雲的詩學觀與性格兩個層面加以推論。

《野鴻詩的》便曾記有「何以宗杜」的問答如下：

向有客問曰：「『盛』、『中』、『晚』名家不少，而子必以少陵為宗者，何也？」余曰：「儒家者流，未聞去聖人而談七十子者也。」<sup>106</sup>

此條除了彰顯黃氏論詩獨尊杜甫，這位「客」的疑問尚可解讀為：「詩壇名家輩出，為什麼單把這個至聖的位置給杜甫？」可是黃子雲回以「自然是先論至聖而次及他者」，答覆並沒有切中要點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更能昭示他心中鐵則為：

---

詩話》，頁 289。

<sup>102</sup> 筆者未得見此二著作，僅以《蘇州府志》所載：「黃子雲《野鴻詩的》昭代叢書、《浣花集箋》縣志、《長吟閣詩集》十卷。」再者，《蘇州府志》亦記有：「金壇王澍為書『長吟閣』三字以贈子雲。」從「浣花」可推知「長吟」同樣與杜甫有關，黃子雲並以杜詩中的「長吟」一詞為書齋名。分別參見清·馮桂芬、清·李銘皖、譚鈞培修：《（同治）蘇州府志》，卷 137，藝文 2，頁 58 上；卷 96，人物 23，頁 24 下。

<sup>103</sup> 唐·杜甫著，清·仇兆鰲注：《杜詩詳注》，卷 17，頁 1515。

<sup>104</sup> 殷瑜：《黃子雲「野鴻詩的」研究》，頁 22。

<sup>105</sup> 此應是指黃子雲除了無緣官場而難以伸志；據《蘇州府志》所載：「嘗偕編修徐葆光使琉球，足跡所經，南北萬里。」他還曾隨官員遠赴外島，參照《野鴻詩的》自序：「奔走海內外罹三十寒暑。」可謂半生流轉遷徙。第一項見清·馮桂芬纂，清·李銘皖、譚鈞培修：《（同治）蘇州府志》，卷 96，人物 23，頁 24 上。第二項見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47。

<sup>106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6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48。

杜甫是詩聖乃無庸置疑，並不構成問題。

黃子雲之所以對杜甫如此推崇，可藉由殷瑜理出《野鴻詩的》三項論詩標準：憂國憂民的情志、正風易俗的詩教，以及獨標己格的藝術風貌。<sup>107</sup>對黃子雲來說，杜甫便是三者兼具的詩人，所以他反覆重申自身詩學脈絡：

能鼓漢、魏之氣，擷六朝之精，含咀乎《三百篇》之神者，唯少陵一人。<sup>108</sup>

詩自曹、謝、庾、徐至少陵而結穴。<sup>109</sup>

不論是寫其總攬唐前各時代的詩歌精髓，還是能包舉曹植（192-232）、謝靈運等諸位詩家特色，黃子雲不斷地凸顯杜甫是集大成的千古一人。這是源於黃子雲自言「詩有道統，不可不究其所自」，<sup>110</sup>強調詩歌的淵源承衍，並提出：

孟子繼二帝三王之道者也，然私淑者孔子；浣花繼兩漢、六代之詩者也，然私淑者子山。<sup>111</sup>

在論及儒家傳統中，起自堯、舜，傳至孔、孟的聖賢體系，黃子雲同時梳理由杜甫繼承自漢、魏、六朝所延續的詩學脈絡，這種將儒家道統與詩歌發展相提定論，可謂是清代常見的尊杜思維，如孫微所說：「宋人和清人在注杜中的許多偏頗也是如出一轍，……杜甫被作為詩歌領域內的道德典範，其人被尊同於孔孟，其詩亦被視同六經來讀了。」<sup>112</sup>宋代因理學興盛，從研讀儒家經典的角度理解杜詩，清人又延續此「詩中聖人」的尊杜觀，認為杜詩是宣揚儒家詩教的最佳典範。

<sup>107</sup> 殷瑜：《黃子雲「野鴻詩的」研究》，頁 13。

<sup>108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1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47。

<sup>109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2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47。

<sup>110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7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48。

<sup>111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 21 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51。

<sup>112</sup> 孫微：《清代杜詩學史》，頁 44。

在這種把詩人比肩於聖人的時代思潮中，黃子雲也將詩歌藝術比附儒家宗門，衍生出：「杜陵兼《風》、《騷》、漢、魏、六朝而成詩聖者也。外此若沈、宋……昌谷輩，猶聖門之四科，要皆具體而微。」<sup>113</sup>藉由對應杜甫至聖一人與其餘唐人僅是孔門四科，更加強調獨步詩壇的前者是黃子雲心中唯一登峰造極的存在。

除了詩學理路之外，黃子雲的內在性格應亦為其極端尊杜的原因之一。除了上文的「唯少陵一人」，《野鴻詩的》亦有指斥中唐「下此不得染指」<sup>114</sup>，及「宋以後無譏」不將後來的詩人放在眼裡<sup>115</sup>，這種一概否定的語氣透漏了詩評家的決絕態度。而且不單於詩論呈現，黃子雲詩作亦有：

憶余童子時，先君子命題紙爆，余傲于忠肅〈詠石灰〉詩體云：「萬壘驚笈束此生，劃開天地半空聲。粉身碎骨非兒戲，要向人間鎮太平。」……稍長，作〈述懷〉詩，中有云「拚命酒盃消白晝，嘔心文字哭青天」二語，一時傳誦。<sup>116</sup>

面對父親出題作詩，年少的黃子雲選擇了仿作明朝于謙(1398-1457)〈詠石灰〉曰：「千槌萬鑿出深山，烈火叢中煉幾番。粉骨碎身都不顧，只留清白在人間。」<sup>117</sup>藉此寫爆竹甘願自我犧牲，換取天下昇平，雖說同樣地忠肝義膽，但詩歌在取法意向上隱然偏執。後來又以「拚命」、「嘔心」等語入詩，皆可見其太過剛硬的性格。

雖然黃子雲也曾反省：「此皆過於忿激，非風人溫厚之旨也。」<sup>118</sup>自言這類詩作褊急而不合乎詩教。在旁觀者看來，其仍一如往昔地作風激烈，像是清人沈

<sup>113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6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48。

<sup>114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14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0。

<sup>115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26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53。

<sup>116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63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60。

<sup>117</sup> 此詩雖未見於其《忠肅集》，不過康熙朝官修的《四朝詩》則選錄在于謙名下。再者，明清人亦有以此感嘆于謙一生高風亮節，被誣陷判死，如明代江盈科曰：「于忠肅公謙，……讀其詩，可想其人，若〈石灰〉篇，公一生讖兆，具是矣。」又如清人金埴云：「于少保忠肅公謙，少時〈詠石灰〉詩……，烈忠亮節，彪炳日星，此詩蚤已自為寫照。」第一項見清·張豫章等奉敕編：《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集部》第701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月分不詳），御選明詩卷104，頁10。第二項見明·江盈科：《雪濤詩評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4年12月），頁766。第三項見清·金埴：《不下帶編》，《筆記小說大觀》第36編（臺北：新興出版社，1978年3月），卷2，頁24。

<sup>118</sup>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第63條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860。

懋惠(?-?)在《野鴻詩的》的〈跋〉以「品極峻峭」形容其品量嚴峻；<sup>119</sup>錢林(1762-1828)更言「其狂易如此」，<sup>120</sup>直指黃子雲論詩極為疏狂。甚至有藉其個性作為品評，如清代汪啓淑(約乾隆年間)〈沈祚昌傳〉記載：

吳中詩人黃野鴻，性極嚴冷，傲睨絕俗，不輕許可人，見虹橋(按：沈祚昌自號虹橋居士)所製印，輒嘖嘖稱羨不已，作詩以贈，並丐其篆法，爭藏去之，其技足珍於人，蓋可知矣。<sup>121</sup>

顯然黃子雲的倨傲脾氣很具標誌性，故而在汪啓淑凸顯他人作品非凡時，足以黃氏挑剔作風為鑑賞文物的指標。

此外，蔣寅論黃子雲所處的康、乾之際詩學演變時指出：

深入考察康熙末到乾隆初詩學的演進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王漁洋詩學頻遭貶斥，葉燮詩學被門人輩光大並以沈德潛為代表漸居主流地位的消長過程，……黃子雲的詩論中發展為強烈的自我表現傾向。<sup>122</sup>

除了有格調派的尊杜與詩教觀為基礎，黃子雲還欲以濃重的個性色彩矯正神韻說流於重複性光景描寫之弊。那麼他更可謂有意識地把自身剛強執拗的性格加諸詩論，是以此確立了「《詩經》——漢——魏——六朝——杜甫」之脈絡，並匯歸為「必宗少陵」的絕對詩觀，然後將此脈絡以外的詩家一律摒棄，形成了杜

<sup>119</sup> 清·沈懋惠：《野鴻詩的·跋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頁 867。

<sup>120</sup> 錢林評黃子雲曰：「成《詩的》上下卷，龍標、太白、昌黎、東坡之詩，概所麾斥，以下不足言矣，其狂易如此。」認為《野鴻詩的》摒棄王昌齡、李白等諸位名家之作，如此論詩過於狂妄。另，「狂易」指異常的疏狂輕率，如《漢書》論有：「體貌不恭，怠慢驕蹇，則不能敬萬事，失在狂易。」顏師古注：「狂易，謂狂而易其常性。」說明舉止放縱便缺乏誠敬，有狂傲輕率之弊。評語見清·錢林輯，清·王藻編：《文獻徵存錄》(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85 年，清代傳記叢刊影印咸豐 8 年〔1858〕刻有嘉樹軒藏板)，卷 10，頁 56。字詞解釋見漢·班固撰，唐·顏師古注，楊家駱主編：《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》(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3 年月分不詳)，卷 27 中之上，頁 1353-1354。

<sup>121</sup> 清·汪啓淑：《續印人傳》(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8 年 5 月)，卷 3，頁 1。

<sup>122</sup> 蔣寅：〈「神韻」與「性靈」的消長——康、乾之際詩學觀念嬗變之跡〉，《北京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第 49 卷第 3 期(2012 年 5 月)，頁 10。

甫七絕「高駕王、李諸公多矣」、相較杜詩「李不逮多矣」等，這些結合詩教傳統、尊杜，及強烈自我表現等因素的獨特說法。更甚者，黃子雲反對「杜陵歿後，義山可為肖子」，可說是因李商隱詩有寄於情愛、綺語者，已然被黃子雲劃分為悖於溫厚而「思無不邪」的詩人；那麼當有人將李商隱構及自身詩學體系集大成的詩聖杜甫，便引發他全力批駁以維護此系統的純粹性。

如此再對應乾隆朝主盟壇坫的沈德潛除了評《野鴻詩的》為「多創論」，<sup>123</sup>其《清詩別裁集》亦提及：「野鴻……中年後成《詩的》上下卷，龍標、太白、昌黎、東坡概為揮斥，以下更不足言，而已詩頽放，前後如出二手矣。」<sup>124</sup>看似僅點出《野鴻詩的》評詩之果斷，不過在與黃子雲後期詩作疏略輕慢的負評並論時，似乎還隱隱言其詩話之武斷，那麼「多創論」的「創」字更襯托出黃子雲持論在清人眼中的異常與極端。

## 六、 結語

蔣寅曾表示：「要在清代文學中舉出一門代表性藝術的話，那我傾向於投文學批評一票。」<sup>125</sup>在同樣發展鼎盛的清代詩論中，黃子雲也欲以《野鴻詩的》傳遞詩學觀。受到清人將杜詩鉤連至儒家道統的思潮影響，黃子雲樹立了起自《詩經》，經歷漢、魏、六朝的脈絡，並以情志與詩教兼具的杜詩，作為含咀前賢精氣神的集大成者，該詩話可謂與時人一樣熱衷尊杜。但是黃子雲又因其過於剛硬的性格，加上有意識地使理論具備個人色彩，促使他恪守必宗少陵的主張，在涉及杜甫的議題上提出與輿論異軌的獨創見解。

黃子雲為了貫徹其詩觀中杜甫乃上下千百年的大家，不只在律詩、古詩等公認的體裁上稱揚之，更極力以七絕出自《詩經》之源，強舉為獨步此體的霸主。再者，因堅決詩學系統僅能有杜甫一人立於至聖之位，縱然是有詩仙盛譽的李白，也被黃子雲斥為下筆粗率、慣於摹擬而不由興寄，不過依憑家世才得以播名盛唐，究李白實學僅能瞠乎杜甫之後。此外，黃子雲的批駁尤以有七律善肖杜詩之稱的李商隱為甚。蓋因黃氏認為李商隱專以靡曼妖魅詞語為詩，用典旨在誇耀學識，人品已然邪僻，詩作又入魔道，全然背離黃子雲倡導詩應教化溫厚與心繫民瘼的宗旨，但世人卻將李商隱比附於詩聖，致使黃子雲厲聲訶斥二者天懸地隔，以確保自身論詩體系的絕對純正與杜甫高不可攀的至尊形象。

<sup>123</sup> 清·沈德潛：〈懷人絕句〉，《歸愚詩鈔》，《沈歸愚詩文全集》，卷 20，頁 7 上。

<sup>124</sup> 清·沈德潛：《清詩別裁集》，卷 30，頁 15 下。

<sup>125</sup> 蔣寅：《清代文學論稿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9 年 6 月），頁 6。

然而相較於黃子雲宣揚「必以少陵為宗」的特殊詩觀，事實上，清代詩壇普遍認可王昌齡、李白才是正宗的七絕聖手，又往往視杜詩不合正格、疏少餘韻，斷言此體非杜甫所長，未見有如黃子雲將杜詩七絕高駕於王、李之上。再者，清人不僅承繼自古的李、杜並稱之說，更抱持二位大家均是各逞其能而馳騁詩壇，不能也不須分別優劣。另外，對於李商隱學杜，詩評家不但以其古詩、排律，尤其七律深得於杜甫，甚至將李商隱詩當作後學欲往詩聖境界的最佳導引。

可知黃子雲種種關於杜甫的詩觀，與清人的共識明顯背道而馳。不過縱使黃子雲頗為時人讚賞，其詩話至今已少有人研究。本文藉由將《野鴻詩的》與其他論者之見進行對照，不光能夠襯托出前者論調之極端，另一方面也能逆向地透過這種異論為反面例證，彙整清人在杜詩七絕、李白與杜甫並稱，以及李商隱學杜這些議題上的共同觀點。

## 徵引書目

### （一）傳統文獻

- 漢·班固撰，唐·顏師古注，楊家駱主編：《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》，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3年分不詳。
- 唐·元稹：《新刊元微之文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蜀刻本。
- 唐·杜甫著，清·仇兆鰲注：《杜詩詳注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0年7月。
- 唐·杜甫著，清·楊倫箋注：《杜詩鏡銓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7月。
- 明·王嗣奭：《杜臆》，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86年11月。
- 明·江盈科：《雪濤詩評》，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4年12月。
- 明·胡應麟：《詩藪》，臺北：文馨出版社，1973年5月。
- 明·許學夷著，杜維沫校點：《詩源辯體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7年10月。
- 明·高棅：《唐詩品彙》，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3年，影印汪宗尼校訂本。
- 清·方世舉著，郝潤華、丁俊麗整理：《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5月。
- 清·王士禛：《古詩箋》，松江文萃堂藏板，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。
- 清·王士禛：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0年，影印康熙洪氏松花屋本。
- 清·王士禛：《然鐙記聞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12月。
- 清·王士禛等：《師友詩傳錄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12月。
- 清·王夫之：《薑齋詩話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12月。
- 清·田同之：《西圃詩說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12月。
- 清·朱庭珍：《筱園詩話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12月。
- 清·何焯：《義門讀書記》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5年，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影印乾隆34年（1769）本衙藏板。
- 清·吳喬：《答萬季野詩問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12月。

- 清·吳喬：《圍爐詩話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 12 月。
- 清·宋大樽：《茗香詩論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 年 12 月。
- 清·宋萃：《漫堂說詩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 年 12 月。
- 清·李重華：《貞一齋詩說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 年 12 月。
- 清·汪啓淑：《續印人傳》，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8 年 5 月。
- 清·沈德潛：《說詩碎語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 年 12 月。
- 清·沈德潛：《清詩別裁集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香港分局，1977 年，影印乾隆 25 年（1760）教忠堂重訂本。
- 清·沈德潛：《歸愚詩鈔》，《沈歸愚詩文全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 年，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乾隆教忠堂刻本。
- 清·沈德潛：《唐詩別裁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 年 8 月。
- 清·金埴：《不下帶編》，《筆記小說大觀》第 36 編，臺北：新興出版社，1978 年 3 月。
- 清·施補華：《峴傭說詩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 年 12 月。
- 清·徐增：《而菴詩話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 年 12 月。
- 清·翁方綱：《七言詩三昧舉隅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 年 12 月。
- 清·翁方綱：《石洲詩話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 12 月。
- 清·清高宗御選：《唐宋詩醇》，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71 年 1 月。
- 清·張謙宜：《覲齋詩談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 12 月。
- 清·張豫章等奉敕編：《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集部第 701 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
- 清·賀貽孫：《詩筏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 12 月。

- 清·賀裳：《載酒園詩話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12月。
- 清·賀裳：《載酒園詩話·又編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12月。
- 清·馮桂芬纂，清·李銘皖、譚鈞培修：《（同治）蘇州府志》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8年，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清光緒8年（1882）江蘇書局刻本。
- 清·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12月。
- 清·黃叔燦：《唐詩箋注》，松筠書屋藏板，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。
- 清·葉燮：《原詩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12月。
- 清·管世銘：《讀雪山房唐詩序例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12月。
- 清·潘德輿：《養一齋·李杜詩話》，郭紹虞編選，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12月。
- 清·錢良擇：《唐音審體》，昭質堂藏板，臺北國家圖書館藏。
- 清·錢林輯，清·王藻編：《文獻徵存錄》，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85年，清代傳記叢刊影印咸豐8年（1858）刻有嘉樹軒藏板。
- 清·錢泳：《履園叢話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18年（1838）述德堂刻本。
- 清·薛雪：《一瓢詩話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12月。
- 清·顧嗣立：《寒廳詩話》，清·王夫之等撰，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12月。

## （二） 近人論著

- 王順貴：〈沈德潛與其同調黃子雲格調論詩學觀辨析〉，《西南交通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12卷第6期（2011年11月），頁35-40。
- 吳文治：〈黃子雲及其詩論《野鴻詩的》〉，《古代文學理論研究》第一輯（1979年12月），頁334-345。
- 孫微：《清代杜詩學史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4年10月。
- 殷瑜：《黃子雲「野鴻詩的」研究》，長春：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，陳向春先生指導，2012年。
- 張書城：〈說李白「本姓李，其先隴西成紀人」〉，《天水師專學報（哲社版）》1991

年第 2 期（月分不詳），頁 112-113。

陳伯海主編：《唐詩彙評》，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5 年 5 月。

蔣 寅：《清代文學論稿》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9 年 6 月。

蔣 寅：〈「神韻」與「性靈」的消長——康、乾之際詩學觀念嬗變之跡〉，《北京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第 49 卷第 3 期（2012 年 5 月），頁 10-26。